

前言

2009年香港電影業界興致勃勃地為香港電影慶賀「百年大壽」，成為了國內外傳媒的焦點。在多數香港或中國電影史的論述裡，《偷燒鴨》攝於1909年，有些電影史學者便據此確立這部諧趣短片為香港電影之始。在這個問題上，近年學術界出現了不少爭議，主要圍繞著兩點：其一、《偷燒鴨》是否攝於1909年？其二、它是不是「香港電影」？前者涉及對史實的確證，後者則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特別在未能確定前者之前，香港電影資料館選擇了以另外一個方式去回應這個香港電影誕生的問題，那就是透過細緻認真的學術研究，繼續探討，並且不限於香港電影，而是希望能藉此機會，重新審視中國早期電影的歷史書寫。2009年12月15至17日的「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再探研討會」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機緣下辦起來的。

在研討會最後一天的「圓桌會議及總結會議」上，多名學者聚首一堂，其中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議題就是對「早期中國電影」的界定——可不可以界定？如何界定？界定的意義在哪裡？對這類問題，即使在歐美國家，亦出現過不少爭議。我們初擬這個研討會時，對這個問題也作了不少討論，最後「折衷」地將研討的範圍定在1930年代以前，即電影於十九世紀末來華以至中國電影開始走進比較工業化的那個階段。1922年，「明星」創辦，1924、25年間「大中華」、「百合」、「天一」、「長城」、「神州」、「民新」等比較具規模的電影公司相繼成立，1920年代是商業電影蓬勃發展並走向劇烈競爭的重要階段。從技術層面來說，這段時期還是一個純默片的年代；1929年美國有聲電影開始進入中國市場，我們的有聲片是1930年初開始邁步的。遺憾的是，1930年代之前所能看得到的拷貝少得可憐，對中國電影那段時期藝術上的研究幾乎無從著手。換句話說，1930年代以前的「早期」中國電影史基本上是一部嚴重缺乏「文本」、也因而更依賴印刷文獻的電影史。電影發展之初，無論在西方或是東方，這門新生媒介都難登藝術的大雅之堂，在中國更被視為「小



道」，當年的紀錄固然非常有限，其後對各類文獻的保存亦不重視。其後歷史上的種種滄桑，令文獻的流失更為嚴重。因此，即使在印刷文獻方面，我們也顯得捉襟見肘，學者們因而要加倍費勁。收錄在本書裡的文章便充份反映了這個狀況。

中國電影的內容包括甚麼，我們的電影史一直沒有真正處理，或者不是沒有思考過，而是或囿於時代的氛圍而影響了視野，或因其盤根錯節的複雜性質而無從著手。前朝遺留下來的殖民地歷史、連綿不斷的外侮內亂、意識形態的割裂與分歧，都嚴重干擾了文化歷史的書寫。

這本論文集取名《中國電影溯源》，顧名思義，就是要尋找我們電影的「祖宗」，回到源頭上去。歷史的書寫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做歷史研究要有容納修正和重構的雅量，新的史料不斷被挖掘出來，觀望剖析的角度也會隨著時代的推進而有所調整。幾乎在每一篇文章裡，都會提及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聯合編寫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提出質疑或修正在所難免，它畢竟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段的產品，但總的來說，大家都同意，這沉甸甸的上下兩大冊仍是迄今涵括面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中國電影史書。多年來，中外學者無論是對電影史的修正或建構，都免不了從《發展史》出發。兩年前，李少白老師因腿患未能來港參加上述的研討會，卻寄來了一封信，以示支持，信中說：

歷史是科學，但它不同於實驗科學，研究它，只有靠史料了，而史料總在不斷的發現與開拓之中。迄今為止，在中國早期電影研究領域，又發現了一些新的史料，又開闢了一些尋找史料的新的途徑，以及運用史料的新的方法。……

史料與史識相輔相成。跨地域、跨學科與跨媒介、跨文化的研究應成為中國早期電影研究的新的出發點。

書中文章恰恰體現了這兩方面的探究與嘗試。

本書的第一部分「中國電影源頭」，是切切實實的追根溯源之旅，從「中國第一」的《難夫難妻》到「香港第一」的《偷燒鴨》、《莊子試妻》，作者們從史料出發，試圖解拆電影史上經典之成為經典的背後故事與意義。這其中涉及的層面很多——史料的挖掘、篩選、鋪陳與詮釋，早期民國年代殖民文化與原始中國電影的關係，意識形態與歷史鬱結對電影史書寫的影響等等。這其中隱藏著一種「去中心」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明顯跟歷來主流的中國電影史有所偏離。在是次的探索之旅裡，班傑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不期然成為了討論的重要焦點，大概他本人也萬萬意料不到。關於這個討論的重要文獻，特別收錄在附於本書的光碟中。

近年來學術界甚熱衷於全球化的討論，跨國性質的研究變成了當今顯學，中國電影史也如泛泛楊舟，在這個大潮中載沉載浮。今時今日，「一日千里」這類詞彙已不足以形容當下網絡發展的速度，影響所及，現在不少文獻資料在網上幾乎垂手可得，令資料搜集的工夫也相應更加「跨國」起來。一方面，這是一個重新思考電影史的論述策略的契機，另一方面，面對浩如煙海的資料，我們更容易迷失方向。在這種處境裡，傳統治學的方法與修養，仍不失為一盞「穩定軍心」的明燈。

假如書的前半部嘗試從實證去追溯中國電影的「物質」源頭，第二部分「工業與藝術」除了從史料堆裡挖掘並呈現早期中國電影的面貌，也從理論層面上去思考中國電影在觀念與藝術形式上的初始狀態。早期中國電影跟現代中國有著怎麼樣的關係？它是怎麼樣建立起自己的類型與語言？正如前文談及，我們的早期電影史嚴重缺乏「文本」，畢竟談電影，電影本體還是至為關鍵的。在影片文獻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我們的作者用心地努力著，順藤摸瓜，試圖尋找歷史與美學間的聯繫。必須承認，我們對早期中國電影美學的研究貧脊薄弱，先天嚴重不足，寸步難行。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們更能體會到前



輩們書寫早期中國電影史的困難，對後來者的焦慮就更是感同身受。在這樣的現實裡，只能寄望各地的電影資料館加強合作，資源共享，如侯曜編導的《海角詩人》（1927）便是學者在瑞士洛桑的電影資料館裡發現的。¹

「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再探研討會」於2009年舉行，近兩年後始能成書，非常感謝當年協辦機構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的李培德博士，以及贊助活動的美國伊利諾州大學東亞及太平洋研究中心傅葆石教授和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葉月瑜教授。是次研討會參與者眾，提交的論文題材廣泛，可惜篇幅所限，這次出版只能集中在「溯源」的關節上，對多篇內容豐富扎實的文章只能割愛。謹借此角，特別感謝本書所有作者以及李少白老師、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教授、李道新教授、黎錫先生、劉輝博士、魏萍女士、鍾寶賢教授、三澤真美惠博士、邱淑婷博士、瀧下彩子女士和李鎮先生。

編輯委員會：黃愛玲 郭靜寧
吳詠恩 何思穎

註釋

1. 見張真：〈侯曜、格里菲斯「熱」與中國早期通俗劇的文化生態〉，本書頁223。